

明學這樣的研究對象時，即使我們對既有的學譜式的觀念史進路有着諸多不滿，我們仍然難以完全置他們對心性理氣的討論於不顧，而直接採用時下流行的話語進行解讀。畢竟，是我們需要去專注而費心地聆聽和思考明代理學家們的聲音和關懷，而不是相反。盡可能客觀地看待和理解這些跟我們操持着不同話語的前人，對身處「局外」的我們來說，或許不會比既屬身在廬山的「局內人」，並且又背負着明亡之痛的黃宗羲更困難吧。黃氏在《明儒學案·凡例》中為自己定下一條規矩：「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着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這一力求客觀的態度，也許是我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應該努力保持的一份自覺。從以上角度看，呂妙芬在其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明居仁與陳獻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是一典型的觀念史作品，而在嘗試運用社會文化史視角的本書中，作者時時流露出處在兩種不同治學方法之間的困窘，但正是這種審慎的態度，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點恰恰體現了傳統治學途徑中推陳出新的古老命題！

劉勇

中山大學歷史系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By TOBIE MEYER-FO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xv, 281 pp.**

本書的中文版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清初揚州文化》（作者中文名為梅爾清）。但是原來的英文書題“Building Culture”包含着至少兩種含義：1）把某一個建築物當做某一個文化圈與文化活動的基地；2）在明清之際動亂之後重新建造精英（elite）文化。讀者必須了解這兩種含義才能夠把握作者的意旨。

此書分為五章。第一章是清初揚州物質與文化重建的背景介紹，包括揚州的地理和歷史以及1644—1645年間的破壞。對於本書的論題更重要的是清初著作常引用的形容揚州的意象：「蕪城」（出自鮑照《蕪城賦》）、「放蕩」（源於隋煬帝的巡幸揚州）和「浪漫」（從杜牧的「揚州夢」）。作者表示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索17世紀下半葉的揚州，而非一般人比較熟悉的18世紀的以鹽商和《揚州畫舫錄》為主的揚州。

第二章到第四章探索清初揚州精英文化的重建。每一章專門論及某一個地點和建築物、與這個建築物最有認同關係的人物、和此建築物聲稱最關鍵

的文化活動。揚州推官王士禛於1662和1664年在紅橋（也作虹橋）主辦修禊是第二章的主要內容；第三章探索1651年文選樓的建造，以及鄧漢儀在該樓於1670年代編輯《詩觀》的過程及其意義；第四章的題目是汪懋麟、1674年平山堂的重建和17世紀文人與歐陽修的認同。

在這三章中，作者不但詳細地描述三個建築物的歷史過程，也把論點擴展到更廣泛的歷史問題。首先，作者認為歷史學家經常把清朝官僚（尤其是「二臣」）與明遺民之間的區別劃分得太清楚，甚至於以為這兩類人物之間毫無關係。其實，在清初文化活動上清朝官員與明遺民以階級的利益為主，一起合作重建精英文化。例如，作者指出王士禛特別邀請杜濬、陳允衡等有名明遺民參加1662年的紅橋活動。這類活動顯示有意地超越朝代性（transdynastic）精英階級的身份認同（頁32）。換言之，在清初揚州文化圈中，精英階級的文化認同克服了明清鬥爭導致的政治上的認同衝突。

其次，作者提出休閒旅遊以及都市中的旅遊目的地的修建在精英階級文化創造上的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繼承了近年來歐美學界漢學家的一系列對於都市機構，如花園（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廟宇（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等，與精英文化創造和精英認同形成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取向。這些著作都看重休閒活動與紳士勢力之間的關係。

本書更特殊的貢獻是讓讀者感覺到文化創造和文化象徵利用的彈性。譬如，紅橋是明代最後的十年中才構造的建築物，並未受到當時文人的重視；但是，在王士禛與他所聚集的文人之詩文中，紅橋被當作是繼承明末精英文化的顯著的象徵。此外，即使揚州在經濟方面於明末已經顯示繁榮的面貌，但是一般的學人不會把它看為一個屬於江南的城市；然而在清初學人想像中，揚州變為典型的江南文化重鎮。另外一個例子是，揚州不是原來的文選樓（即蕭統於6世紀編輯《文選》之處）所在。不過，在考證學未普遍發展的時候，揚州本地的文人和遊揚州的文人重視詩文的想像而比較忽略歷史的正確性，且聲稱1651年在揚州「重建」的文選樓是個古跡。除了上述的例子以外，作者還舉了不少有趣的例子來說明文化的創造性。雖然標榜某一個建築物或都市文化地點的文人都會引用關於該處的「典故／掌故」，但是，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文化圈為了新的目的都在反復利用舊的文化象徵（頁193）。

此書的第五章與前面的三章不同，探索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比較熟悉的揚州，即《揚州畫舫錄》所描述的，經濟繁榮、鹽商勢力最大的18世紀之揚

州。不過，本章跟前面的三章一樣，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建築物、一個人物和一種活動。本章的主題是清朝皇帝（尤其是高宗）南巡以及皇帝在揚州所住宿的天寧寺和天寧寺旁邊的行宮。作者強調，18世紀的揚州已經出現不同的氣氛，並且在18世紀，揚州本地的精英階級與17世紀後半葉者有不同的優先權之觀念。18世紀的揚州不再重視以歷史感為主的文人之觀光活動，反而標榜以高宗南巡為代表的奇觀／壯觀活動（spectacle）。再者，在概念取向上，把揚州看作江南重鎮之一的理想已經廢棄了；然而18世紀的文章經常強調揚州與京師和皇帝的文化關係。這麼一來，王士禛、鄧漢儀、汪懋麟等人觀念／想像中的揚州已經下臺了。因此，第五章也當作《清初揚州文化》的結論。

在不少歷史學家近年來強調地方精英階級之後，本書的另外一大貢獻是提醒讀者，如果要了解某一個地方的精英文化，不能不考慮到跨地域／超地域（transregional）的交流和網絡。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早已談到合併幾個大城市的「江南學術社會」（Jiangnan academic community）；本書把範圍擴大了，強調了清初揚州地方文化其實是本地精英與來自各地的官僚、遊客一起塑造的。再者，作者認為創造跨地域文化在清初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現象。例如，在第三章論及鄧漢儀的《詩觀》時，作者指出該集的正式的名稱，《天下名家詩觀》，表示清初精英階級的跨地域之立場／取向。但是，讀者不應該從這個論點推論到當時各地都能夠編輯自稱代表「天下」的詩集。反而，因為能夠執行編輯代表天下的詩集這個活動的地方並不多，所以這種活動也表示清初揚州已經變為少數有勢力的文化重鎮之一。因此，很難論定清初全國的跨地域性。

總之，本書的巨大貢獻不限於分析清初揚州文化；作者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文化歷史方法，即把地點／建築物、文章和精英網絡的分析融合起來。再者，利用這個方法也使得本書結構精銳。雖然本書的中文版將要出版，但是，因為作者理論與文體並重，且原書英文含蓄精煉，所以英文版很值得一看。

麥哲維（Steven B. Miles）  
（美）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